白洋淀上觅犁踪

苑英科



一

我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在白洋淀上追寻孙犁的踪迹，把他去过的地方，一次走个遍。但是多年来，这一愿望未能实现。

孙犁是安平县人，那里离白洋淀还很远，他与白洋淀的缘分，始于1936年夏天，育德中学同学侯世珍约他一起到安新县同口镇小学教书。“七七事变”后，由于战火遍燃和洪水阻隔，他未能再返回同口，在家乡参加了抗日工作。1945年冬，孙犁从延安返回冀中，先是在蠡县下乡，后到河间编刊物。1947年春，他作为《冀中导报》的记者到白洋淀的端村、新安、采蒲台、同口等地采访，写出了一组作品。1972年初夏，因参与京剧剧本《芦花淀》的改编，他随创作组和剧团，到寨南、王家寨、郭里口生活了一段时间。这就是孙犁在白洋淀大致的行踪。

我的家乡在白洋淀南，小时候到过同口镇和端村，懵懂之中没留下什么印象。后来，由于工作关系，多次途经安新，但从未完整地走过孙犁到过的那些地方。中秋节前，一位朋友终于安排了这样一个行程：用一天的时间，先是开车到端村和大田庄，坐船半小时到采蒲台，再乘船在大淀中游览一个半小时，经王家寨到郭里口，之后舍舟登岸，坐车到安新县城和同口镇。虽是走马观花，但心愿得偿，愉悦的心情多日不曾散去。

二

我们从保定开车直接到端村。过去，端村是有名的水旱码头，曾有“一京二卫三端村”之说，相当繁华和热闹。孙犁在同口镇教书时，每次回家，都要在端村打尖。现在，这种热闹的场景不复存在，既没有织席的，也见不到捕鱼的，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从端村到大田庄很近。抗日战争时期，白洋淀有两支水上游击队：雁翎队和三小队。雁翎队在大田庄、端村一带活动，三小队则在郭里口、赵北口活动。孙犁描写白洋淀的第一篇作品是1939年创作的长诗《白洋淀之曲》，描写的就是端村、大田庄雁翎队的故事。

雁翎队刚成立的时候，手里的武器是渔民打雁的大抬杆。当地人介绍，小船上一般安有两根大抬杆，一粗一细，粗的放空枪，“砰”的一声，把水面的大雁惊飞，当它们飞离水面时，细管的大抬杆响了，喷出一片扇形的铁砂粒，被击中的大雁纷纷坠落下来……打鬼子的时候，不管是粗的细的，装的都是实弹，被称为“扫帚炮”。

大田庄有一座明代古庙，名叫东头庙，庙里有一块牌匾，刻着“清泉庵”三个大字，应该是这座庙的名字。东头庙是雁翎队生活、学习和训练的地方，吕正操、程子华、孟庆山、杨成武等人，也多次在这里召开工作会议，进行抗敌斗争。庙内的东厢房，有一个简单的展览，介绍了大田庄的抗战历史，陈列了钢盔、手枪套、军号、提灯、电台、收音机等实物。一块展板上，印有一首《雁翎队之歌》，这和王家寨三小队打包运船时的那首《雁翎队之歌》完全不同，歌词是这样的：

划哟！划哟！
小木船，划向前！
打鬼子，捉汉奸！

问我的家来，家不远，
家就在白洋淀。
长火枪，小木船，
“扫帚炮”就在船头安。
昨天我水上把雁打，
今天又和鬼子缠。

问我的姓来，问我的名，
雁翎队威名震。
端炮楼，捉汉奸，
虎胆雄心闯狼群。
水上摆下迷魂阵，
芦苇丛中把敌擒。

问我的武器哪里来，
东洋鬼子给我们造。
东洋枪，东洋刀，
东洋子弹东洋炮。
浑身上下是东洋货，
雁翎队员本领高。

歌词质朴无华，生动活泼，洋溢着快乐的情感和旺盛的斗志，是一首名副其实的队歌。

三

在大田庄村头，我们上了铁皮机动船，到采蒲台去。现在的大淀，都是这种铁皮船，很少见到过去那种小木船了。

踏上小船的一刹那，望着浩渺的淀水，我忽然想到：孙犁初到同口镇，距今整整90年；1947年的那次采访，也已过去79年；1972年他最后一次来白洋淀，也是54年前的事情了。

这样想着，一时心绪纷乱，淀水在眼中变得迷离起来，我仿佛看到一位身穿长衫的青年，坐着木船穿行在大淀的水雾中，弥天的水雾很快化作遍地硝烟，那个瘦高的身影，急行于冀中平原、阜平山地……

铁皮船尾发动机的“突突”声，把我拉回到现实中。我怀念小时候坐过的小木船，怀念那“哗，哗，哗”的桨声。

大淀上很安静，有一只下网的小船，停靠在不远处的一片水草中，那里散落着几片荷叶，居然还有一支挺立的红艳艳的荷花。

孙犁为采蒲台写过两篇文章：《采蒲台的苇》和《采蒲台》。前者写于1947年，后者写于1949年。孙犁来这里的时候，采蒲台是一个水中村，“房屋街道挤得像蜂窠，一条条的小胡同，窄得两个人不能并肩行走，来往相遇，只能侧身让过。一家家的小院落，飘着各色各样的破布门帘。满街鸭子乱跑，到处苇花飞”。现在，采蒲台通了公路，村里的街道很宽，房屋大都是新盖的，或许是为了防潮，院子里都铺上了地砖。街上不见鸡鸭，院里没有渔网。村里最具年代感的建筑，是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烈士祠。抗战时期，采蒲台是堡垒村，这栋十米高的青砖小楼，是用来纪念采蒲台十八位抗日烈士的。

采蒲台村口有一个水泥雕塑，造型是一本展开的书，一面刻着“铁打的采蒲台”几个大字，另一面刻着孙犁《采蒲台的苇》中的一段话，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关于苇塘，就不只是一种风景，它充满火药的气息和无数英雄的血液的记忆”。当地有这样一句民谚：“金圈头，银淀头，铁打的采蒲台。”说的是圈头村和淀头村物产丰富，十分富足。采蒲台盛产芦苇，旱涝都有生计。孙犁的那句话，是对“铁打的采蒲台”的另一种诠释，可以看作抗战精神的一种形象化的表达。

四

从采蒲台到郭里口，完全是水路，花了一个半小时，走了三四十里。淀水茫茫，波光粼粼，正如孙犁在《荷花淀》中描写的那样：“水像无边的跳荡的水银。”淀水十分清澈，能看到下面的水草和游鱼。船两边不时出现一群黑色的鸭子，还有静立水中，一动不动的长脖子老等（苍鹭），偶尔有一两只白鹭在水面上滑翔而过。至于那一片片的芦苇荡，更是让人叫绝。老船夫告诉我们，现在的芦苇退化了很多，过去的苇子至少大拇指粗，丈二高，现在的苇子细弱了不少，能长到一丈高就不错了。

前面是一片望不到头的荷叶，船一经过，便翻滚起碧绿的波浪。一位老人正在小船上捆绑采摘下来的莲蓬，还有一位年轻人开着小船疾驰而过，船上装满了裁成扇面状的新鲜荷叶。

远远看到一个村落，老船夫告知，那就是王家寨。附近这片水域，苇塘密布，是三小队重要的隐蔽据点。1943年，三小队在这里打了包运船伏击战。孙犁的《荷花淀》就是以这个故事为素材创作出来的。当时他并没有来过王家寨，是凭借同口镇和端村的生活积累完成这篇作品的。1972年，为创作京剧剧本《芦花淀》，孙犁到寨南和王家寨深入生活，采访了当年的雁翎队队员，自己写了一个剧本交了上去。这个名为《莲花淀》的剧本，后来发表在保定的文学刊物《莲池》上，他还专门写了《京剧脚本〈莲花淀〉自序》，与剧本一同发表。

王家寨是白洋淀唯一一个还没有通公路的村子，村边水岸，停满了铁皮小船，岸上也有几条破损的木船倒在草丛中。村子北边，有一座绿树掩映的小岛，名曰“望月岛”，原是早年清淤堆筑而成的一片荒滩，现在已经开发成了王家寨民俗村，岛上有19个民宿小院，整洁漂亮。我们的船经过的时候，看到一条游船正在靠岸，也有不少人登舟离去。从望月岛乘船，可到达荷花淀大观园和雁翎队纪念馆。

我们并没有在王家寨停留，直接去了郭里口。当年，孙犁到寨南不久，就开始身体不适，一个名叫刘双库的年轻人，把他接到郭里口住了一段时间。在这里，孙犁找到了自己的战友，一直在郭里口小学教书的葛尧。1945年初，葛尧离开部队，到白洋淀体验生活，准备写几部小说。来到郭里口村，他看到村里的房子全被烧光，村民们只能在芦苇棚中生活，几百户的村子没有一所学校，他内心受到极大震动。几经思考，他放弃了自己的写作计划，在村里办起了第一所小学，开始了自己的教书生涯。1949年初，组织上通知他到天津做接管工作，他没有去，在郭里口小学一干就是四十余年。孙犁晚年创作的《芸斋小说·葛覃》，就是以葛尧为原型的。我们找到郭里口学校，学校是新建的，并非当年葛尧教书的地方，但是，校园里有一座小亭，亭子里面竖着一块葛尧纪念碑，记载了他的事迹。

中午，我们在郭里口吃了一顿农家菜，除了荷叶炒鸡蛋、油炸小河虾，印象最深的是炖鲫鱼，是我从小就熟悉的家乡味道。这种鱼的做法，可能与别处稍有不同，鲫鱼去内脏，再过油煎，用猪油煸炒甜面酱，投入葱姜糖等佐料，再放入煎好的鲫鱼，倒入少量酱油，烹入大量香醋，盖上锅盖焖几分钟，再倒入开水，炖至鱼骨酥烂。饭店里的鲫鱼火候要小些，味道却不差。

五

从郭里口坐车，绕道雄县，穿过雄安新区的一片建筑工地，便到达安新县城。在当地干部的带领下，我们到城外寻觅老渡口，那里只有茫茫淀水，一只船都没有，岸边是一片干净的绿草，没有任何渡口的痕迹。1947年，孙犁写了《新安游记》，这是一篇锄奸故事，还写了《安新看卖席记》。这些都已是陈年往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颇具现代气息的城市。

开车半个多小时到达同口镇，我们先去看了陈调元庄园。庄园建成于1922年，当时有半个镇子大，现在只剩下一个三进院落，卧板青砖，徽派建筑，虽然历经水患，依然坚固和气派。孙犁在同口当小学教员的时候，身份低微，不能进入庄园，只能在黄昏外出散步时，看一看庄园高大的围墙。在他眼中，这座庄园对村民来说，是一种威胁，也是一种压迫。新中国成立后，陈调元庄园做过学校，至今大门两侧还镌刻着带有时代印迹的标语。

我们在庄园里走了两趟，屋舍俨然，仿佛在默默诉说着旧日的辉煌，而院中那一片片杂草，又透露着被遗弃的荒凉。在庄园最后一排正房东侧的房内，建有一个地下室，打开手电筒，顺着窄窄的楼梯下去，里面阴森森的，四五十平方米的样子，还有一个佛龛。

孙犁教过书的同口镇小学，在庄园东南不远处。跑去一看，孙犁记述中的那座二层小楼早已不在，只剩下一堵砖墙，成了一家小超市的北围墙，超市南面是“二牛饭店”。

对同口镇，孙犁是怀有深厚感情的。1947年，他故地重游，写下了《一别十年同口镇》，满怀热情地描写了土改后村民的新生活。陈调元庄园分给了无房的军属，孙犁终于走进了这座庄园，看到穷人们按照自己多年的劳动生活习惯，居住在这个院子里。

孙犁或许没想到，1947年的白洋淀之行，最终会成为一段不愉快的经历。他在《新安游记》中弄错了街道的方向，在《一别十年同口镇》的结尾，为进步了的富农说了几句话，联系他的家庭出身，当年冬季的土地改革会议对他进行了批判，之后还给他扣上了“客里空”的帽子。

1982年，冉淮舟编了一本名为《琴和箫》的孙犁白洋淀作品集。孙犁应邀作序，后又写下了散文《同口旧事》，文中回忆了他到同口镇小学教书的经历，记述了育德中学同学侯世珍、黄振宗等人在抗日斗争时期的人生遭遇。

这天夜晚，我们夜宿高阳县城。这里离同口只有十几公里，1947年5月，孙犁就是从高阳出发，越过潴龙河大堤，走到同口去的。

孙犁在白洋淀生活的时间不算长，白洋淀却是他生命历程中最为亮丽的风景；他描写白洋淀的文字也不算多，那些文字却是他文学创作中最为耀眼的记录。他给白洋淀留下了什么？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地域风骨，还有白洋淀的风景美、人情美、人性美。这些，就是我们不断寻觅的东西吧！

何以副刊

多希望你的文字被看见

红孩

2026年9月14日，著名作家王蒙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撰文《办气韵生动的副刊》，引起新闻界的广泛关注。作为老媒体人、曾长期主编《中国文化报》文学副刊的编辑，我自然也对这一话题十分关注。

我在上世纪80年代就读过王蒙先生的作品，他当过《人民文学》主编、文化部部长。1997年，我在《中国文化报》主编文艺副刊时，他已经离职。说来有趣，1985年我高中毕业，分配到京郊农场一家畜牧场，那里养着数百头北京黑猪，还有两万只鸡。那是一段百无聊赖的日子，那里的一切都与文学无关。最初的几个月，我干了许多零活儿，搬砖、铺路，割青草。某日，我在场区里闲逛，无意间走到场部后面的工会活动室，里面的报架上竟然有几张《中国文化报》，这让我喜出望外。我家里不缺报纸，当村支书的父亲订有《北京日报》《法制日报》和《参考消息》。如果说农场畜牧场订有《北京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我都可以理解，但怎么会出现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中国文化报》呢？我没问任何人，就把几张报纸都拿走了。一至三版我没细读，主要是看四版的副刊“大潮”，上边刊有小说、散文、诗歌。此前，我虽然在几家内部报纸上发表过小说、散文，但冠以“中国”“文化”这样“大词”的国家大报，我还从未尝试过投稿。当时的我更不会想到，在1996年12月31日，我会正式调到这家报社，并且在1997年下半年，担任了这张报纸副刊的主编，一编就是二十几年。

我之所以要写这篇文章，也是因为我的朋友，《天津日报》原文艺副刊负责人宋曙光兄，近两三年连续发表了《粉笔之忆》《铅字记忆》《书信之忆》《累累硕果——“文艺周刊”从1000期到3000期》《纸墨香不散》《编辑的素养与修为》《再谈编辑的素养与修为》等多篇文章，这些谈报纸副刊编辑生涯的往事与心得，让我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

记不得和曙光兄是在哪年哪月相识了，最直接的记忆是2011年7月，在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与天津日报社举办的首届“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评奖中，我作为评委之一参与了讨论投票。记得当时评奖条件有几个硬性规定，第一是担任副刊编辑须满二十年，第二是编辑的作品获得过中国新闻奖。那次共评选出十位获奖者，《天津日报》宋曙光就是其中之一。也就在这一年的11月，在天津静海团泊新城举行了颁奖活动。在那个活动中，我和宋曙光有几分钟交谈。后来回忆，在之前参加的由天津市群众艺术馆、东丽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东丽杯”全国群众性文学评奖中，我们也曾多次见面。

宋曙光1975年到天津日报社工作时，我刚上小学一年级。我很羡慕曙光兄，他从学校一毕业就分配到报社，而我高中毕业后则分配到京郊农场下边的一家畜牧场。曙光兄先在报社排字车间工作，每天都要不停地举着手托、拿着镊子，一个铅字一个铅字地排稿，而我每天要经手两万多个鸡蛋，把它们过秤、装箱，批发零售出去。虽然经历不同，但我们都有文学梦想，他从排字车间到编辑部只有一步之遥，目睹过自己的一首小诗，从写作、编辑、拣字，到排版、印刷的全过程。我虽然在农场组织过文学社，也用铁笔在钢板上刻蜡纸，印过诗报，可那距离编辑部还有十万八千里。然而，我又是幸运的，在农场工作六年后，1992年，我正式调入了《北京工人报》。虽然不是编文艺副刊，但算是走进了报社的大门。1997年，我辗转几家报刊后，正式调入《中国文化报》，且担任文艺副刊主编。此前，我曾参与中国文联《中国艺术报》的创刊筹备，报纸创刊后，我担任新闻部负责人。全年五十期报纸，我写了二十六篇头条。那一时期，我最重要的收获是结识了李光羲、资华筠、石维坚、李维康、刘兰芳、孙道临、谢芳等全国最顶尖的各界艺术家，为我以后的文学创作打开了一扇扇窗。

关于如何办好报纸副刊，很多老报人都有很好的经验。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宗白华、梁实秋、郁达夫、徐志摩、沈从文、孙伏园、夏衍、柯灵等人都办过报纸副刊，鲁迅、胡适、冰心、老舍等人，也几乎都是报纸副刊的主笔。1932年，张恨水最多时在北平《世界日报》《新晨报》和上海《新闻报》《晶报》等十家报纸副刊开专栏连载小说。后来的金庸也是靠给报纸副刊写小说而成名。

孙犁先生主编的“文艺周刊”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形成了一整套办副刊的风格。在这一点上，我相信《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大报的副刊，也都有各自的文化传承。只可惜，我所在的《中国文化报》1985年才创刊，之前的报社副刊同仁，虽然也大都是文坛名家，但终因各种原因，在报纸副刊待的时间并不长，使《中国文化报》副刊始终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所以，当我后来接手副刊时，首先要考虑的是副刊的定位，是走名家路线，还是走文化系统路线，或者说综合考虑。当时的报社社长王文章是戏曲专家，他处事果断，尤其对当代有影响的艺术家十分看重。那一时期，媒体的竞争压力很大，我们报社又是自筹自支单位，报社上下都在想办法开拓经营思路。即便是在这样的压力下，王文章也没有让文艺副刊减版，更不增加经济压力，为副刊提供了宽松的环境。

在京城，有很多优秀的报刊编辑，我认识的有《人民日报》的石英、王必胜，《人民文学》的周明、崔道怡，《十月》的张守仁、王占君，《解放军报》的曾凡华、陈先义，《文艺报》的贺绍俊、冯秋子，《工人日报》的胡健、王恩宇，《北京日报》的李培禹、赵婷等，不下百位。这些编辑虽然经常见面，但很少进行工作上的交流。因此，当我阅读宋曙光写的《编辑的素养与修为》《再谈编辑的素养与修为》等系列文章时，就觉得这是一位老编辑在和年轻编辑及读者谈心。在很多人看来是鸡毛蒜皮的编辑琐事，在他眼里，都关乎编辑自身的形象，甚至会影响报纸副刊的质量优劣。



从如何对待自发来稿、怎样改稿，谈到约稿的技巧，又具体谈到稿费、样报，可以看出，作为一名副刊编辑，宋曙光很在意作者的每一篇稿子，理解作者写稿的不易以及对编辑回复的期盼。这让我感同身受，我曾无数次地对自己和编辑说，邮箱里的每一篇稿子都要看，哪怕只是简单地扫上五秒、十秒，特别是那些写父母亲情的，我总要多看两眼。常有编辑同行抱怨，邮箱里的来稿大多是写父母亲情、故乡风景的，没有新意。我说，人这一辈子，最熟悉、最难割舍的就是亲情与故乡，写是作者所需，写出不一样的才是编辑所需。

著名编辑家周明是我的良师益友，他在《人民文学》当编辑时，曾策划编辑了大量优秀的报告文学，如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黄宗英的《小木屋》《大雁情》等。我曾问他当编辑的诀窍。周老师说，当编辑就是给别人作嫁衣，对作家作品可以有偏爱，但绝不可以有偏废。一份好的报刊，要有兼容心、包容性，允许百花齐放，这样的报刊才会受到读者欢迎。黄宗英曾在给周明的一封信中，称赞其为“插柳不叫春知道”。我想，这样的编辑精神，也体现在诸多优秀的文艺副刊编辑身上。

作为一名编辑，每天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编辑稿件。副刊的来稿很多，需要面对的作者也多，同时还要关注不同的题材和体裁。一个好的副刊编辑，一定是一个对政治、历史、民俗等各方面都非常敏感的人，同时也需要熟知历史上重大事件的时间节点，这样就可以提前有针对性地约稿、组版、开专栏、搞征文。同时，编辑还得是一个好的社会活动家，团结一大批作家，登门拜访，时常联系，了解作家的动态，知道他们正在写什么作品，刚从何处采风回来，这样才能第一时间约到需要的稿件。在我看来，作者和编者是互相成全的关系。对待名作家和普通作者，每个编辑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一般情况下，名家的作品是有质量保证的，但有时名家也会写出稍显平庸的作品。反之，有些新人作者也会写出佳作，这对编辑来说，会像发现遗珠一般欣喜。

副刊编辑应该是个杂家，仅就文学而言，应该对散文、小说、诗歌、报告文学等都有基本了解。除此以外，还要对音乐、戏剧、书画、舞蹈、曲艺、影视、民俗、军事、经济、体育等方面都有所涉猎，这就要求编辑得有真功夫。我的老友，曾任《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主编的李凤翔老师喜欢看戏，经常头天晚上看完戏，连夜就写稿，稿件转天就能见报。

文章到此，似乎还有很多话要说，假如有朋友还想交流编辑副刊的心得，期望你们都能各抒己见，我多么希望你们的文字被看见，这对于办好文艺副刊大有裨益。

（作者曾长期担任《中国文化报》副刊部主任，文艺评论获得第二十二届中国新闻奖，现任中国散文学会监事长）

旧时光里的细碎记忆

——忆母校与恩师

刘建民



我曾无数次梦见过我的母校——那时还不知“渤油一中”这个名字，一直称它为“海洋石油一中”。

记忆中，最初它的名字叫海洋石油勘探子弟学校。大约是1972年底或1973年初，我开始在那里读小学，直到1976年地震后小学毕业去读初中，1981年参加高考。

高考那几天，天似乎不热，好像还下了一阵雨。我只记得在学校门口上了学校安排的车，落座之后发现竟与往常不同，车窗上挂着窗帘，车内凉风习习。从母校到考场，车队一路上收获了无数羡慕的目光。后来得知，这是厂子专门为参加高考的子弟们安排的空调车，那也是我第一次乘坐有冷气的车。

车内空调再凉也压不住内心的紧张，到了考场，短短的十几分钟，我竟跑了两趟厕所。

第一门是语文。考试内容已记不清，只记得作文好像是就《金屋银屋不如自己的草屋》写篇感想。我自然是围绕自己的“草屋”畅所欲言，从未想过为什么自己不能有“金屋银屋”。

中午考罢，空调车队把考生们送回家。下午在西门乘车再赴考场时，发现语文老师王卓之面色红润，一副快意神情。王老师板书极好，硬笔书法也很是俊朗。不过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年有一天我们正在操场上练前滚翻，他溜达过来，说：“你们这都不行，我给你们来一个。”只见他搓了搓手，瘦小的身体向前一跃，在垫子上做出了一个标准的鱼跃动作，惊得我们这些同学面面相觑。当时的王老师也是年近五十的人啦。

第二天上午考数学。曾自信地以为，我这辈子不会忘记一道高考数学题，可惜记性终敌不过岁月的侵蚀，如今只记得有一道大题没做出来，犯了平时总先在脑子里把题做一遍的老毛病，找不到解法的那一刻便怀疑题出错了，耽误了不少时间，等落在纸上寻得思路时，已经没有时间了。

考完试吃罢午饭，在等校车的时候，教数学的那文斓老师慢慢地走过来，笑着问我：“能上九十吗？”我摇摇头说：“也就七十五。”那老师面色一沉，不再言语。我羞愧不已。不过那天我的确没撒谎，等最后出了成绩，不多不少真就得了七十五分。

很多年后的一天，我竟然在梦中再次见到了我的数学老师那文斓。当后来同窗聚会，我把这事儿说给大家听时，一位同学对我说：“那老师已经去世了。”掰着手指头算算，他离开我们的时间，正是我梦见他的日子。这么多年，那老师一定一直惦记着不争气的我！

2018年深秋的一天，我站到了挂着渤海石油第一小学牌子的西门前。这虽然不是我毕业几十年后来的第一次，却是印象最深的一次。那天，我在西门前盘桓了片刻，心情出奇地平静，不似以往那般心有波澜。隔着铁栅栏，目光由近及远、自西向东地从小学上课的楼、初中上课的楼向高中上课的楼看去。可惜人老眼花，记忆中的楼依稀还在，还多了几座从未见过的建筑。

在这座校园里发生过很多事，有一件事让我至今难忘，并将它用文字记录了下来。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早上，我刚进西门，忽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循声望去，竟是小学三年级时教我数学的长辫子杨老师。杨老师迎着我说：“我都等你两天了。”我怯生生地问：“有什么事吗，杨老师？”“没事，我从别人那里搞来一套高考复习资料，给你抄了一份，你看看有没有用。”我一时语塞，真像书里面讲的那样，忽然有一股暖流从心底涌出。那时，不要说一份复习资料有多难得，单是一笔一画地给我抄一份，也足以让人感动了。毕竟那是上世纪80年代，听说过复印机的人没几个。工作之后的一年夏天，我到母校的滨海西区想看看长辫子杨老师，可惜当时她没在，听说是外出休假了。

不能忘却的不只是长辫子杨老师，还有教历史的王老师，教地理的王老师，教英语的徐老师，教政治的林老师，教物理的夏兴安老师等等。尤其不能忘记张文超老师，是他，在课堂上放由他自己朗诵的陶斯亮《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录音，听得我们眼泪汪汪；是他，讲《鸿门宴》时，在黑板上挂出他亲笔绘制的樊哙画像；还是他，送我一本《长短录》，让我打开思路，好好写作文。

如今我已是退休之人，无所事事间抚今追昔，也有些日子没梦到母校了。我一直深信，凡是入过梦的，无论人或事，即便记忆会慢慢模糊，但绝不可能忘记，更何况母校以及母校的老师，关乎我的成长，怎么可能会忘呢？

本版题图 张宇尘

文艺周刊

第三一〇三期

不熄

澜江河

服从时间召唤
让火苗
沿山脉走向蔓延

仍是前进的奔跑者
为地火刻下岩层的呐喊
骏马踏碎岷山冰凌
蹄印里 春天蛰伏千年

风过荒原 复燃成火塘

长征的影子

黄深厚

别拿地图的冰冷
丈量来路
别用时间的刻度
计算征途

九十年前
那支高举镰刀红旗的
队伍
从瑞金出发
翻越夹金山
走进苍茫的高原

从瑞金到阿坝
纸上相隔四千里山河

是浴血辗转的
万里长征

两河口的风
吹散过犹豫

卓克基的油灯
撑开过暗夜

毛儿盖的抉择
校正过
前行的星辰

是阿坝高原
把九十年风雪
磨成刀刃上的光

火星溅落处
格桑花
绽开新的诗行

90长征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征稿作品选登——

喧嚣归于宁静
我们如两粒相认的火种
隔着九十年睫羽轻颤

唯有风记得
每粒尘土
都是长河深处不灭的星光